

第一章

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 (cultural practice) 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我在本章中所要建构的就是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也是我在以后的章节中要加以阐述的关系这并非一种轻率的主张：它并不是说全球化是现代文化体验 (experience) 唯一的决定因素，也不是说惟有文化才是开启全球化内在动力的概念性钥匙。所以，它并不是要去主张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是服膺于某种概念先行的文化叙述的，而是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由全球化所描绘的巨大的转型式进程，除非从文化的概念性词汇去着手，否则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同样，这些转型所改变的恰恰就是文化体验的构造，而且，它的的确确影响了我们的感觉：在现代世界中，文化究竟是什么？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文化，都是概括性很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同时，众所周知，它们的意义所引发的争论也最多。本书自然不会企图对这两者做详尽无遗的分析，但我有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试图在一种所谓的“文化记载” (cultural register) 中去理解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在本章中，我将在这种文化记载范围之内提出对全球化概念的定位性理解，继而试图阐明：为什么文

化与全球化两者彼此在本质上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化：复杂的联结

为建构这个论点 我想从一个简单的、相对不大会引起争议的理解谈起。人们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是说，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的一种经验主义的（empirical）状况 我将把它称之为是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而全球化指的就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联结（connectivity）的概念在当代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中都可以找得到，虽然形式可能有所不同。让我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麦格鲁（McGrew）说“全球化”不过是全球相互联系的增强而已”，他强调了它所隐含的联动（linkages）的多重复杂性：“今天 商品、资本、人员、知识、形象、犯罪、污染物、毒品、时装与信仰都轻而易举地跨越了领土的边界。跨国网络、社会运动与社会关系实际上延伸到了从学术到性的各个领域，可谓无所不在”（1992:65,67）。从这里 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们所说的联动是以一系列不同的模式存在着的，它从个体与世界范围的集体之间正在激增的社会-制度性的关系 到跨越国界的商品、信息、人员与实践日益增加的‘流动’（flow）的概念，再到由技术发展所提供的连接（connection）的更加‘具体’的模式（诸如快捷的国际空中运输体制、更实际的‘有线’电子通讯体制等）这期间变化不定、难以把握。

麦格鲁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写作的，但类似的系统阐述——“相互联系”、“网络系统”、“流动”——同样可以在社

会学研究（拉希和厄里，1994；卡斯泰尔，1996，1997，1998）、文化研究（霍尔，1992）或是人类学研究（弗里德曼，1995）中找到。这个事实证明了，人们对全球化使我们所依赖的经验主义的现实至少有一种基本的同感（consensus）度。正是这些有多重价值的连接现在跨越了现代世界，把我们的实践、我们的体验以及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命运捆绑在了一起。所以，全球化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既要理解这种复杂的联结的状况之起源，又要阐释它跨越了社会存在的不同领域的含义。

全球化概念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的各种含义似乎是轻而易举、丰富多彩地就从其中流动出来了。它是一种非同寻常、容量丰富的概念，产生了远远超出完全是社会事实的思索、假设和强大的社会形象与隐喻。当然，一方面，这可以归于全球化的声誉，因为日益增长的联结这个简单的事实局限在了自己的利益之内，而且，无须解释和详尽的阐述，它就能够保持一种几乎是平庸的观察力。因此，联结就成为了一种需要直接加以详尽阐述和阐释的状况。然而，这么做还是存在着某种危险的，即人们会倾向于似乎是围绕着全球化的概念打转转，致使对全球化的认识反倒模糊不清了。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详尽阐述联结的中心概念时，需要保持某种慎重的态度。为了说明详尽阐述之必要和它可能产生的陷阱，我想观察两种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中，“联结”这个简单的概念逐渐演变到了其他主题之中。

► 联结与亲近感

首先，联结的概念可以被视为是喻示着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间的亲近感（proximity）也就是马克思在《手稿》（1973a）

中所说的“时间导致了空间的湮灭”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1989) 则把它指称为“时空的压缩”。这里所包含的是一种距离的收缩感,它是通过很明显的时间的缩减——要么是有形的(如通过空中旅行),要么是再现性的(如通过电子传媒传输信息与图象)——从而跨越了时间。从另一个分析的层面上来看,联结通过跨越距离的社会关系的“延伸”(stretching)这一概念,渐变到了空间亲近感的概念之中(吉登斯,1990,1994a,b)。全球化话语充斥着全球亲近感的隐喻,充斥着“正在缩小的世界”的各种隐喻。从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著名的论断“地球村”到联合国最近发明的、用来形容正在出现的世界-政治语境的词汇“我们的全球邻居”,都是这样的隐喻。所有这些隐喻和形象,其日益增加的亲密感 (intimacy) 就来自联结不同模式的延伸和详尽阐述。但是,亲近感/亲密感与联结并不是一回事:它充其量是一种详尽的阐述,往差里说,它是一种滑动 (slippage)。

作为对全球现代性状况的一种描述,亲近感有自己的真实性而且,一般而言,它不是一种现象学的序列,就是一种隐喻的序列。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把普通意识中的世界的外貌,描述成是更为亲密、更具压缩性、更是日常估算之一部分的模样——比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使用快捷的运输方式或是日常的传媒技术,把远方的形象引入到我们最亲密的地方空间之中。在第二种情况下,亲近感传达了真实的距离性 (distanciated) 关系在隐喻上日益增加的直接性和重要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我们生活的各种连接,比如,连接我们的银行帐户到全球资本市场的金融网络系统,或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类似“全球变暖”这一共同的全球性的环境威胁,才有意义,仿佛它们真的是把我们引向了更近距离的接触。于是,亲

近感使我们超越了联结的“经验主义的”状况。这并不是说，语言使人误入歧途或着说是无效的，而是说它对“亲近感”的概念与“联结”的概念加以区分是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 联结的状况不仅首肯了亲近感的观念 而且在我们理解全球“密切性”(closeness)的方式上也打上了自身的烙印。被联结，意味着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变得密切了：由这些联结所产生的‘亲近感’的体验 与某种无可争辩、棘手的、持久的、在世界各个地方与人们之间存在的有形距离(physical distance)并存 对此 无论是全球化的技术还是其社会转型都还无法用魔法驱逐它们。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中，西班牙人与墨西哥人依然相互分离、相距 5,500 英里 就象 16 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1]被冷漠、危险的汪洋大海所阻挡那样。而联结的意思则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体验这种距离了。我们把这些远距离的地方，完全想象成是在日常中就可以涉足到达的地方，无论是通过通讯技术或是大众传媒再现性地到达，还是相对花费一点时间（当然，还要一笔钱）乘坐越洋飞机亲自到达，在今天看来，它们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了。所以，墨西哥市与马德里市之间，就不再意味着是 5,500 英里的距离 而是 11 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而已。

的确 人们在思考由联结的‘技术’模式所造成的特殊的“亲近感”的感觉方式之一，就是要考虑到由空间体验进入到暂存的体验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恰恰是空中旅行的特点。飞机真是时间的容器呀。当我们登机的时候，我们就踏上了一个自我封闭和暂时独立的政体，而它好象故意要把我们的体验从超高速的空中飞行运动中几乎完全转移开来一样。飞机起飞后，人们所熟悉的程序是，分发报纸、奉送免费饮料、送餐、出售免税商品以及在飞行中放映电影，所有这一切都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机舱内部的时间结构上。于是，从现象

学的意义上讲，我们的“旅行”就成了这种熟悉的时间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空间变化的结果。从伦敦到马德里，不过是一顿饭的时间；从马德里到墨西哥，也就是两顿饭的时间、外加一场电影和小憩片刻。对更远距离的运输而言，也不过如此而已。只有当我们偶尔眼望窗外——或许只是在寻找海岸线吧——我们才会在瞬间捕捉到某种感觉：我们是在跨越多么遥远的距离啊。而这种空间给人的庞大、遥远的感觉，再加上很快能使人联想到我们自身的弱点及其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或许使我们没有勇气去细想这个外在的现实。^[2]令人感到慰藉的是，他们不停地把飞行数据展示出来，不断地把数千英里转化为“距离终点还有多少个小时”：这就变成了我们真实的现实情形。的确，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们飞越其上空的地区才会侵入到我们空中飞行的体验之中。或许，机组乘务员可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某些特殊的有形特征上——“在我们飞机的左侧，您可以看到科德角半岛^[3]”——但是，像下述这样令人在更深层次上感受人类领土的例子是少之又少的，因此也就显得颇为古怪：“当一架国际航班飞越沙特阿拉伯上空的时候，空姐们就会宣布说，在飞越该国领空途中，机舱内将禁止饮酒。这就意味着领土对空间的入侵。土地 = 社会 = 国家 = 文化 = 宗教：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平衡，飞快地铭刻在了空间之中”（奥热，1995：116）。马克·奥热（Marc Augé）把这阐释为是文化的厚度对飞行空间的“非地方”（non-place）的短暂入侵，但我们同样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象征，是空间（领土）的外在性通过时间进行的一次封闭式旅行的急切渗透的象征，而空间（领土）的外在性看上去似乎离我们的体验相去甚远，事实上也是毫不相干。

在这个封闭的时间旅行器内经过数小时的飞行，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办完了海关手续，走出机场终端大楼，然后象变

魔法似得感叹到，“我们到了”。我们依旧是登机时的这身装扮（这是我们那不太遥远的家的一个有形的连接物），却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这里有不同的气候，或许还有不同的语言，当然还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么，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了哪种“亲近感”呢？简单地说，由空中飞行带给我们的联结究竟是怎样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的呢？无可否认，不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或（相对多的）金钱，你是无法使远方变得伸手可及的。它是把身体的重新定位变成了一个常规性的问题——不过是花费几个小时、一天或者一定的时间罢了。但是，这样的“亲近感”当然肯定也是有疑问的一种“亲近感”，其可疑之处就来自于通过时间而在技术上达到的空间的压缩。因为我们在这些旅行中通过“机舱时间”的常规结果所跨越的空间，并不仅仅是有形的距离，而且还是“真正的”物质空间所保存下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距离（沙特阿拉伯 = 伊斯兰教 = 不准饮酒）。因此，空中飞行的联结向我们尖锐地提出了要克服社会-文化距离的问题。

那么，从飞行悬浮着的快乐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文化调整的问题了。我们所体验的旅行尽管更多的是时间而非空间，但它并没有给我们适应这个地方新的现实提供什么帮助。我们还没有体验到跨越“真实”距离的感觉：渐变的风景、渐变的气候、一系列社会的相互影响、书上或电影中沉闷乏味的情节、被打断与暂停的时间、跨越国境时富有象征意味的时刻以及非常真实的身体感，这些都是由比如乘坐火车旅行时，在“真实的时间”中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但现在在飞行中是无法感受到的。在飞行中，距离的压缩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暂时的移位的感觉，而我们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这样一个现实——它是很直接的，而且在他者性上是富有挑战性的——就因为它是如此容易就使人们涉足到达了。于是，衡

量全球化成就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克服有形的距离跟克服文化的距离之间究竟相差有多远。

我们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此进行思考。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去询问：在现代世界中，你实际到达的地方跟你起程的地方相比究竟有怎样的差异。这就要进入到文化同质化 (homogenization) 的话语之中了。同质化的命题，就是把全球化展示为同步化，与一个标准化的消费文化的要求相同步，使得各地多少有些相似。所以，断言文化同质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就是从联结开始，通过亲近感，走向了全球一致性和普遍存在的想象之中。正如我将在第三章中所要阐述的那样，这是一种积淀物，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不合理的走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样具有某种看似合理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想法跟空中飞行这样的例子联系起来看时，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无可否认，世界上的飞机场终端都大同小异。人们经常指出，通向不同文化空间的出口与进口都惊人得相似与标准化。然而，这种观察方式的意义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飞机场绝对是特殊的场所，它是根据商业功能的要求来设定的，简而言之，是为了实用的公众利益，即为了使国际旅客航行顺利，把文化的差异缩小到了最小程度。要确定同质化的命题是否真的流行了，那你还要冒险走出机场终端的安全线，进一步深入到危险的文化内地之中才能作出判断。这可能是理论家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因为，同实际中文化实践的凌乱与特殊性相遭遇，对建立在与现实遥远的、广泛的抽象性之上的理论而言自然是危险的，比如对同质化的命题就是如此。耐斯特·加西亚·坎克里尼 (Nestor Garcia Canclini) 虽然注意到了趋向于理论抽象化之渐进层面的不同的学科倾向，但他对此作出了曲解性的说明：“人类学家是徒步走进一座城市，社会学家是乘坐小汽车，而且经过的是主要的

干道，而通讯专家则是坐飞机来的。”（1955:4）关于文化的全球同质化的主张，有点像乘坐飞机到达目的地、但却从未离开过机场的终端一样，仅只是把自己的时间消磨在了浏览免税商店内那些全球各地的商品品牌上了。

因此 撇开时下广泛的文化同质化的想象不说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走出机场之后所发生的心态调整的过程，进而去探索一下联结与文化的亲近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这里，全球化的成就看上去变成了一种悠闲的功能，据此可以使人完成心态的调整过程。而这恰恰反映了全球化的某些内在的“不均衡性”。在这个体验的连续统一体的一端，我们有可能在公务舱找到一个有成就的乘客，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他”）在出示自己的凭证时显得漫不经心 实际上 他是在显示自己在到达目的地后已经调整过社会-文化心态了 方便快捷的出租车很容易就把他带到事先预定好的国际饭店，路上，他可以逐渐舒舒服服地去欣赏变化的风景，他完全相信到饭店后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传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商业信息、国际膳食——这些都足以使他在这个语境中去独立行事。因为商业旅行的定位，实际上就是缩小了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商业文化“普遍的”实践能够平稳地发挥作用。这就是联结，它就是要要在功能上达到一种使人体验到普遍性的“亲近感”的虚构形式。因此，对商业人士来说，遥远的地方就要使他们在文化上感到一种密切感，因为他们需要集中精力、根据手上的业务进行仔细地谈判：这就需要饭店和会议室达到国际化的水平，大概只有在华灯绽放的娱乐时分，才会增加几分地方色彩。

于是，从资本主义工具论^{〔4〕}的观点来看 联结在趋向日益增长的一种功能性的“亲近感”方面发挥着作用。它没有使所有的地方看上去都是千篇一律的，但它却创造了全球化

的空间，而且以某种程度的文化的“压缩”，对应了联结的时空压缩，以此连结了易于资本（包括它的商品以及人员）流动的长廊。这当然是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但它并没有抓住全局，而且冒险夸大了由联结到文化亲近感逐渐演变的过程。要知道，商务舱的旅客所没能体验到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日常文化实践的最本质的东西，而这种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locality）而非全球性（globality）来定义的，而且，在具有侵略性的联结面前，它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差异性。这种文化不会在五星级酒店中显现出来，但它会在大街小巷、房屋、教堂、工作场所、酒吧与商店这些远离商业或是旅游中心的地方显现出来。

这类“地方性”都是相当简单的地方，人们在此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家”的日常环境。这类地方，有些可能就与飞机场的环形围墙相比邻，但相对空中飞行的联结部分来说，它们是一个全然迥异的文化“世界”的一部分。很显然，它们不受一种构成了国际商业文化的工具性联结与标准化的同样直接要求的控制。进入到这类环境之中，就意味着踏入了社会生活的秩序，你就可以更多地感受到地方种种事件的摇摆不定而不是全球性的要求，而且，它展示给你的正是“地方性”——即文化的差异——的特殊性。当全球化的讨论提出（就象大多数人所作的那样）“全球-地方”（global-local）关系的时候，这就是它们所产生的那个庞大的日常生活的秩序。

极少会有商业旅行者在这些环境之中流连忘返（当然了，除非是在他们回到自己舒适的地方之后）。因此，当我们从资本的全球化在顺利发挥作用这样的观点去看的时候，这个层面上的文化差异常常是难以觉察出来的。更可能遭遇文化差异的人，倒是那些缺乏组织或是缺少财力的旅行者们：他

们是一些劳工移民，或者是些开销很低的个人旅游者。在机场终端那个全球化的空间里，这类人在到达目的地时可能就没有那么潇洒了，但他们缺乏财力恰恰意味着，他们很快就能渗透到地方性文化的深层次之中：他们乘坐的是公共汽车而不是出租车，下榻的是工薪阶层比邻而居的便宜的旅馆，里面没有象五星级酒店那样人为的文化“隔离”，所逛的也都是当地价格便宜的商店。这些旅游者很快就成为了潇洒的解释学家^[5]，他们在一个全球化商业文化的飞地^[6]之外检验了文化亲近感的真实程度。这样，这种深入至地方性的旅行，才算是进入到文化差异挑战性现实的一种旅行，它也因此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联结离它超越逐渐切入的技术模式去确立“亲近感”还有多远呢？

论述至此，我们就必须超越空中飞行的例子来看问题了。追溯联结的这种模式的现象学，把我们推向了对全球化的一种“高度轮廓化”的理解之中，这种理解本身是颇具诱惑性的，但又局限在它的应用之中。喷气式飞机旅行是联结的内在部分，在其日渐平凡地融入到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它要求人们把它视为文化体验。但很显然，它仅只展现出了联结所喻示的意义的一个方面。这首先是因为，尽管它越来越具有一种无处不在的性质，^[7]但它仍然相对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之中，甚至是集中在这一少部分之中那些更少数的专有人员与频繁的使用者的身上。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有许多人尚没有乘坐过飞机，当然就不用提那些不发达国家了，他们更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象使用因特网一样，空中飞行因此可以被视为仅只是对富人阶层开放的一种全球化。倘若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它自身的主张“全球化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就无法自圆其说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由此类高度轮廓化的

全球化技术所喻示的全球的联结感，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那样正在向一种特殊的、夸张的亲近感靠拢。

如果联结真的喻示着亲近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状况，那么，它就必须根据实践与体验的某种转型来加以理解，对于这种转型，人们可以真正在地方性的内部感受到它，就象人们在既可以使人涉足、也可以使人抽身的日益增加的技术手段中所感受到的那样。拉希（Lash）和厄里（Urry）（1994:252）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尚处在发展之中的社会”而“现代世界如果……没有长途运输与旅行的新形式，简直就不可想象”。我不想对此表示异议，但我认为，不要夸大长途旅行的作用，无论对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还是对全球化的整个进程来讲，都是同样重要的。“地方生活”——在此与飞机场终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电脑终端）空间那易逝的“全球性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庞大秩序，因为有了有形体现的抑制性因素，它甚至又继续在全球化世界中保持着主导地位。地方生活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虽然在不同地方之间进行移动的——无论是有形的还是再现性的——日渐增强的能力是联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但它最终还是要服从于——实际上是派生于——时间和空间定位的秩序，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是“家”。全球化正在使这个地方秩序发生转型，但这个转型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通讯和运输在技术层面上的成就。简言之，联结意味着改变地方性的性质，而不仅仅是让某些人偶尔从中游离出去。所以，我认为，对这样的论断：“现代体验的典范就是跨越了遥远距离的快速流动性的体验”（拉希和厄里，1994:523），应该慎重对待。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全球现代性的典范性体验——这自然并非与收入与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不挂钩——是身在某地，却能体验全

球现代性带给他们的那种‘移位感’。

以此种方式来理解全球化，就是对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联结的其它模式予以关注。特别是，它是要去把握一种“亲密感”这种‘亲密感’来自社会关系的网络，跨越了很大的时空段，导致远方的事件与权力渗透到了我们的地方体验之中。它是要去理解：某些人怎样才可能去面对失业，把它视为是在另外一个大陆的一家公司，由老板在自己办公室“由大到小排列”后所作出的决定的一个结果；或者，我们今天在超级市场里所看到的食品与20年前所看到的是多么的截然不同，就因为在世界主义者的品味与食品工业的全球经济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或者，我们所拥有的文化归属感——即“在家”的感觉——是怎样在细微之处，可能已经被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全球化传媒所改变了。我在以后的章节中，重点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些转型。

► 联结与全球单城性

但是，我现在想把讨论从联结的核心概念暂时转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详尽阐释/滑动”的问题上。这是联结在全球范围内环绕其间的概念，因此也喻示着某种单城性（unicity）的意思：这是一种感觉，即世界在历史上首次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在过去，如果说有可能把社会、文化进程与实践理解为是一整套地方的、相对来说是“独立的”现象的话，那么，全球化则使世界成为了一个“单一的（single）地方”。这方面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经济事件已经被锁定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之内了，或者说，从地方工业进程的环境影响是怎样迅速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世界变成了一个地方”的概念，仅仅偶尔同逐渐增强的联结的概念有联系。尽管“相互联系的网络的快速发展，将最终包含所有的人类社会”这样的想法可能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是这个概念所必然产生的一个逻辑结果。虽然其涉及的范围广博，但很少有人敢断言，全球化复杂的联结以其永久的方式，现在已经触及到了每一个个人或是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因此，在思考其传播时，自然而然必定会掺杂进许许多多相抵触的走向，趋于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分支。对此，我们在自己的周围都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在“单一的 (unitary)”方向上有某种拉力，无论是在全球化的概念上，还是在它所描述的经验主义的进程中，都是如此。“全球的”(global)这一词汇，无论从其隐喻的用法上看（全球即谓“全部”），还是从其几何学形式的纯粹语义学上讲，它本身都具有强大的整体性与包容性的涵义：例如象“环绕”这些与此相联的、具有地球的天体形式的概念，大都是如此。因此，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就自然而然有了一种含蓄的力量“趋向于单域性”，如果我们所认定的联结的经验主义状态没有这样的含义的话，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再使用‘全球化’的话，就仿佛是我们大家全都用错了字眼儿！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单程性的含义得到这种思维方式，它不会引起更多富有争议的滑动性的概念：单域性要么逐渐演变成了“一致性”(uniformity)，要么就演变成了“统一体”(unity)。

罗兰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论述全球化的大量著作都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而且他很精妙地论述了这样一个概念：“世界压缩成了一个‘单一的地方’”(1992:6)。

他坚持认为，“一切都说了，一切也都做了，但世界趋于单城性的倾向是无情的”（1992:26）。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罗伯逊提出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消解了他的这个观点可能引发的某些直接批评。究其实质，罗伯逊所感受到的全球的单城性，是一种日益决定着各种社会关系的语境（context），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参照结构（frame of reference），在这个参照结构中，各种社会力量逐渐在塑造着各自的存在、认同与行为。因此，对罗伯逊来说，全球单城性并不喻示着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一致性，并不是象一种“世界文化”那样的东西；相反，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与现象学的状况——“全球-人类的状况”——其中，人类生活的不同秩序彼此被相互连接在了一起。罗伯逊确认了四种这样的秩序：个体的人类、民族的社会、“社会的世界体制”与“人类”的中心集体。对他来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在上述秩序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影响，因此，“作为单一的地方的世界”就喻示着上述生活形式的转型，因为它们之间的定位越来越有碰撞，同时也都不得不互相有所顾忌。这既不是同质化的单城性，也不是一种显现的全球的（社会）统一体的天真的感受。确实，罗伯逊的单城性模型远不是要确立一种没有疑义的综合进程，而是这样的一种模型：其中，社会与文化差异可能得到加强，因为它是因与“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相联而得以确认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看看罗伯逊的研究方法是怎样处理人们针对他的全球单城性的主要概念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这些意见大都是现代世界中支离破碎的反面例子，如：民族与种族敌视、经济保护主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8]等等。罗伯逊对此的回应是指直这些反面例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事实是，它们都受到了“内省式的控制”。他以当代经济保护主义

为例争辩说：

与旧时的经济保护主义和 18、19 世纪的闭关自守相比……新的经济保护主义具有更多的自我意识，自觉地定位于一个全球范围的体系之中，其中有着全球所遵循的经济贸易的规章制度和全球经济是一体的意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说，此类因素会就此消除保护主义，但它的确说明了，相关的各方，包括“普通的市民”，都越来越被迫要根据“世界是一体”——这并不一定是人们所喜欢的词汇——的概念来思考问题。

因此，对罗伯逊来说，全球联结的结构是与上述情景的无所不在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可避免地将所有地方事件提升到了一个单一世界的水平上。人们常举的一个案例可能会是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中不言自明的“文化保护主义”，它可以被解读为是对“传统的”信仰、价值观和实践的一种自我意识的维护，而这些信仰、价值观和实践都是由逐渐受到削弱了的传统所定义的，同时又受到了全球压缩的威胁。

罗伯逊研究方法中最强有力的一点，即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它保留了全球化既有整体性又有包容性——作为一种语境——这一重要的感受，同时，又允许它处理世界的经验主义的复杂性，而这个世界似乎要去显示综合与变异同时并存的进程。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因特网的技术性的联结——正如当下不断增多的“不同宗派的”网站所做的那样——能够用于越来越富有挑衅性的主张之上了，象种族差异、宗教差异或是民族差异等等。因

此，我认为，罗伯逊根据潜在的单城性来考虑全球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其模型阐释得很精妙，而且还因为出于一种迫切的政治需要要保留这个概念。当联结深入到地方性中的时候，它就使地方的生活体验发生了转型，但它同时还要面对这样一些人：在个人的世界中，无可否认，他们的命运全都被绑在了一个单一的全球框架上。从全球市场的经济一体化或是全球环境风险这样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清晰可鉴，正如尤里克·贝克（Ulrich Beck）（1992:47）所说，它“使一个世界社会的乌托邦变得更加真实了，或者至少更加迫不及待了”。因此，联结把单城性想象为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原则。如果我们要考虑地方体验就必须把它提升到一个‘单一世界’的水平上，而地方的实践与生活方式逐渐需要从它们全球性的后果上加以考察与评价。

文化：全球化的一角

前文所述的大多数讨论都属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记载”，有其明晰的语汇与着重点，与比如经济或是政治的语汇和着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简单地把文化看成是与全球化有关的一个概念和一个实体（entity）呢？一个很常见的回答是：把文化看成是全球化的一个“维度”（dimension）。现在，全球化在很广泛的意义上被视为是一个“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现象——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没有疑义的描述，但如果仔细探究的话，它就需要加以（不仅仅是文化的）分析以明确其涵义了。